

侠义复仇精神从史传到小说的嬗变

——以《史记》、《聊斋志异》为例

康清莲

摘要:《史记》乃“发愤之作”,《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公认的“孤愤之书”,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蒲松龄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为游侠张目、赞赏复仇的创作精神,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史记》中的侠客虽以布衣身份行侠,但他们的名气和声望却不亚于达官显贵,产生的社会影响极广,体现了《史记》作为正史宏大的叙事立场;而《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蒲松龄取材的渠道多为“野叟曝言”,其笔下的侠客多是独行侠,往往依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并且在行侠过程中体现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从行为的主体来看,《聊斋志异》与《史记》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者都是男性不同,蒲松龄塑造了不少光彩照人的女侠,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方式完成仗义之举,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复仇,或为知交,或为国家,而《聊斋志异》的复仇多是报私仇,复仇的方式也迥异于《史记》,虽然看起来不够宏大,但他们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泣鬼神。

关键词:《史记》;《聊斋志异》;行侠;复仇

一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太史公笔法”甚至成为后世撰写历史所依傍的一个准则。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积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①代表了中国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一个作为史传文学的里程碑,一个是描写鬼狐花妖之集大成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蒲松龄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也是历史,只不过是不同于正史的“异史”,这由《聊斋志异》篇末的“异史氏曰”可以得见。《聊斋志异》受《史记》的影响非常之大,单从体例来说,它采用的也是纪传体式的书写方式,《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聊斋志异》传主的身份虽然有些特别,大多数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虚拟的鬼狐花妖,但作者的终极目的却和《史记》一样,是为了“传畸人畸物于千秋”。在写作方式上,蒲松龄有意学习司马迁对人物的撰写方式,先介绍传主的生平履历,然后“以人系事”,选取典型事件来叙写典型“人物”,篇末也常常模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来一段“异史氏曰”加以点评、补充。蒲松龄对司马迁一直非常景仰,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史记》乃“发愤之作”,作者想要“成一家之言”,《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公认的“孤愤之书”,是为了“有意作文,非徒纪事”之作。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蒲松龄曾在《题吴木欣〈班马论〉》里说:“余少时最喜读游侠传,午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②《聊斋志异》中,《侠女》、《聂政》、《红玉》、《辛十四娘》等篇章皆系描写侠士之作。蒲松龄同司马迁一样,皆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选择著述立言的方式,在作品中快意恩仇,一抒块垒,寄希望在万千的读者中,找到真正懂得自己的人——“述往事,思来者”。蒲松龄不仅喜欢读《游侠传》,而且在《聊斋志异》中付诸创作实践,因为侠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千古文人心中皆有一个侠客梦。

收稿日期:2013-08-26

作者简介:康清莲,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 400067)。

①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② 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追根溯源,“侠”与先秦诸子中的墨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因为墨家代表的是广大中小阶层者的利益,墨家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这些正好与侠客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不过,如果我们将侠文化搁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这个大背景来看,它就不单单为墨家独家拥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就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灾难,当人类自身无力解决这些灾难的时候,就幻想有英雄有神灵出世,为人类排忧解难,铲除世间种种不平。这种对英雄主义,对献身和复仇精神的崇尚从最早的口传文学——神话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如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后羿、衔微木填东海的精卫、怒触不周山的共工、追日的夸父、舞干戚的刑天……虽然,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具有非人类的特质,但他们却寄托了人类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幻想,因为他们身上无不具有普通人心向往之的侠义风范。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可谓开创了中国侠文学之先河。他笔下的游侠,以布衣身份行侠民间,舍生忘死,不谋私利,不图回报,解人困厄,这种高尚的品性已经浸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蒲松龄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为游侠张目的创作意图,同时又有个人的突破。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满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上层统治着与下层普通百姓间的矛盾都非常尖锐。在阶级压迫面前,蒲松龄主张抗争,以暴易暴。与《史记》中侠客的巨大感召力不同,蒲松龄笔下的侠客多是独行侠,往往依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行侠针对的目标指向性非常明确;在行侠中还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史记》中仗义行侠的是男人,而《聊斋志异》却塑造了不少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由于女性的身份,她们行侠的方式与男性迥异,多数采用献身的式来完成她们自己的使命,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阳刚与阴柔和谐地集于一身。

二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给游侠如此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司马迁所言的“不轨于正义”乃是从官方角度立论的,正因为人人都会遭遇困厄,当官方在主持正义缺席的情况下,就需要有民间的力量来主持公道,于是侠便应运而生了。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这种意图作了更明确的阐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③司马迁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共同的心声,人类天生就渴慕英雄,就有对美好、崇高品质的本能向往。司马迁概括了游侠身上“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智勇以及“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三种美好品德。

司马迁之所以对游侠情有独钟,与他的身世遭际密切相关。司马迁由于为李陵仗义执言,触怒汉武帝,惨遭宫刑,在危难之时,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的手,世态的炎凉给司马迁最沉痛的打击。明人董份说:“太史公自伤莫救,发愤本意至是尽显矣。”

蒲松龄从少年时代起,就特别喜欢读司马迁的游侠传,甚至半夜三更都一边喝酒一边读游侠传。可以推想,蒲松龄读到精彩处,一定会击节而叹:“于我心有戚戚焉!”蒲松龄虽然出生的年代与司马迁相去近1800年的时间,但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乱未已、各种矛盾尖锐突出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受痛苦最深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中下层地主阶级。蒲松龄对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深恶痛绝,对“官儿太昏,吏儿太劣”的官场看得十分透切。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评价蒲松龄:“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在《成仙》中,蒲松龄借成生之口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

①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87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1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第3318页。

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①在残酷的阶级压迫面前,蒲松龄主张反抗,要以暴易暴,于是,一系列除暴安良、解民于水火之中的侠客便横空出世了。如《王者》中的侠盗;《瑞云》中的侠仙;以死报恩的田七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崔猛。《红玉》中的“一丈夫”,当他看到冯相如“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不思报仇时,就用言语刺激冯相如,“仆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齿之伦!”^②当他听到冯生一席哀怨动人的交心话后,表示自己不愿像公孙杵臼那样去做抚养遗孤之类的“妇人女子之事”,而是不留姓名,不求报答,替冯生杀了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妇,为冯相如出了一口恶气。《辛十四娘》中的婢子,当冯生无端遭到楚银台公子的陷害,身陷囹圄,受尽皮肉之苦,申告无门之时,她便挺身而出,装成流妓,取媚于天子,得以告状,把沉冤昭雪。蒲松龄笔下的侠客与《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朱家等不一样。郭解他们虽以布衣身份行侠民间,不求闻达,但他们的名气和声望决不亚于达官显贵,并凭借自身的名气和声望,吸引了一大批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效死不辞的“少年”。因此官府也对他们畏惧三分,必欲铲除之而后快。而《聊斋志异》中的侠客多是独行侠,独来独往,往往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扶弱济困,他们行侠多是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

《聊斋志异》体现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在蒲松龄的心中,好人就该得到好报,坏人就该受到惩处。《红玉》篇异史氏曰:“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③而《游侠列传》中就没有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侠士们把行侠当作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应该是男人做的事,《史记》在该领域活跃的,就是一群伟丈夫,而《聊斋志异》却塑造了一大批女侠客,蒲松龄把“安良”、“扶困”的美德集中在女性身上,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女性的尊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在我国的侠义小说中,尽管也有不少有光彩的女侠形象,但这些女侠的性别特征并不明显,她们具有的是男侠的一般特征,如红线女夜行七百,帅府盗盒;聂隐娘脑藏匕首,药化人头等。而《聊斋》中的女侠多数是用自己献身的的方式来解救寒素阶层在婚恋、经济等方面的困厄,以此来完成她们的行侠仗义之举。如《侠女》中的侠女,因为顾生“博于材艺,而家纂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④,便为他私生一子,为顾生延续了一线香火之后便杳然而逝;狐女红玉在穷秀才冯相如丧妻鰥居期间出现,充当妻子的角色。当受到冯父指责,觉得自己的存在有碍于冯生的声誉和家庭关系时,便不顾冯生的一再挽留,主动抽身告退,并为冯生赠金择偶。后来冯生遭遇大难,身陷囹圄,又为冯家抚养孤儿,保全了冯生的宗嗣。冯生出狱后,她又重新担任起妻子的角色,夙兴夜寐,为冯家重振家业。《霍女》篇中的霍女,在数年之中未曾生育,便设计为黄生娶良家女为妻,生子兴业,自己则托故抽身而去……。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女子的行为看作侠义之举,就在于她们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无不与侠的内在实质吻合。侠最本质的特征是“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担负起为下层百姓解厄济困、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责任。蒲松龄笔下的寒士多是由于社会不公才使得他们“英俊沉下僚”,穷途末路,以致于连婚姻、香火问题都难以解决。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还有什么比无力娶妻生子更让人觉得困厄不堪的呢?这些女侠,使寒士们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侠的另一个特征是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像红玉这类狐女我们姑且搁置一边不论,侠女、霍女都是人间女子,封建礼学家宣扬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牺牲的是比生命还宝贵的贞操,她们委身于这些男子,一不为情所驱使,如侠女对顾生举止生硬,冷语冰人;二不求建立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侠女曾对顾生说:“枕席焉,提汲焉,非妇伊何也?业夫妇矣,何必复言嫁娶乎?”“相报不在床第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⑤,这纯粹是一种侠义之举,一种壮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霍女惩恶也是以性为手段,她初奔“家富有而吝啬已甚”、“然佻达喜渔色”的朱大兴,使朱家败落。后奔富豪何氏,后来又以自

①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87-88页。

②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279页。

③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283页。

④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210页。

⑤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213、215页。

售的方式骗得富商子的千金之资。用她自己的话说：“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①如此“却富济贫”的行为都是以贞操为代价的。侠客形象还有一个突出的美德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功成身退，施恩不图报。侠女、红玉、霍女等个个如此，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便翩然而去。

司马迁、蒲松龄都盛赞了侠客们诚、信、义、谦这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侠客们的侠义之举让人拍手称快，他们不仅扬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复仇行动让恶人胆寒。

三

司马迁不仅讴歌游侠，同时赞扬复仇。其实，行侠与复仇是一脉两枝，追求的都是快意恩仇。《史记》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写成于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在肉体 and 心灵遭受双重戕害的情况下，太史公用自己手中的如椽大笔惩恶抒愤，极力为复仇者张目，这就使得《史记》中蕴含着一股冲天的复仇烈火。据不完全统计，《史记》中的复仇故事或完整或片断有二十几处，韩兆琦先生曾就《史记》中的复仇做了一个粗略的分类，有的是为国家复仇，如越王勾践、曹沫；有的是为家族复仇，如伍子胥带领吴军打回楚国，鞭楚平王之尸；有的是为知己复仇，如“漆身为癞，吞炭为哑”的豫让；有的是为自己复仇，如改名换姓的范雎。各种各样的复仇，使《史记》充满了浓墨重彩的悲壮色彩。这里仅截取《刺客列传》中的复仇形象来阐述。

《刺客列传》一共塑造了五个刺客形象——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篇末对这几个刺客做了如是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②司马迁之所以给予他们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知交，为了国难。如豫让、聂政、专诸为报知遇之恩而不惜牺牲生命，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曹沫和荆轲是为国家复仇，他们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破釜沉舟，铤而走险，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足以让千秋万代景仰。总之，他们的复仇已超越了宗族和个人恩怨的范畴，顶天立地，感天动地。司马迁对复仇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反暴力、反强权、反凌辱的意义，为后世复仇文学开启了良好的传统。

《聊斋》作为一部“孤愤之书”，塑造了一系列的复仇女神形象。这类女子复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智慧型复仇，《庚娘》、《商三官》堪称代表。《庚娘》全篇突出“智勇”二字，一开篇庚娘就对丈夫说，王十八“彼屡顾我，目动而色变，中叵测也”。对一个陌生的人，庚娘察言观色，即知其为人，真是慧眼灵心，见微知著。后庚娘一家被王十八推入水中，为了报仇，庚娘假意答应嫁给王十八，到王十八家后，王“又欲犯之”，庚娘在此短兵相接之际，从容不迫，笑曰：“三十许男子，尚未经人道邪？市儿初合，亦须一杯薄浆酒；汝家沃饶，当即不难。清醒相对，是何体段？”^③仇恨越深，她越要装笑，笑之中，正深藏着杀机。但明伦评：“古有谈笑却雄兵者，人皆以为奇。此则大仇大敌，近在咫尺，污在顷刻，危在须臾，以柔脆当此，惟有一死，且虑不能洁而死耳，乃谈笑而从容出之，若行所无事。蜀昭烈帝谓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吾于庚娘亦云。”^④与侠女以性行侠相反，蒲松龄在塑造这些复仇女子时，不愿意让她们冰清玉洁之身受到一点玷污。不仅庚娘如此，商三官也是在即将被侵淫的时候，歹徒“忽脑如物击，口血暴污，顷刻已死”；窦女被南三复骗奸而后被弃，表面看来她已不贞洁，但通过她死后的复仇，仍留给读者一个圣女的形象。作者之所以这样写，就是不愿让复仇女神被玷污。

商三官可谓女中豪杰，她父亲被一豪强打死，她的两个兄弟想通过官府伸冤，商三官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⑤此言一针见血，在那个残暴黑暗的社会，地

①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09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8页。

③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383页。

④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384页。

⑤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373页。

下没有一个阎罗王惩杀恶霸,人间也没有一个包青天为受害人撑腰,要想报仇,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为了复仇,商三官改名换姓,女扮男装,装成戏子,苦苦寻找机会,终于在仇人的生日宴会后杀死仇家,然后自尽身亡。商三官的凛凛正气,让人肃然起敬,蒲松龄称她为“女豫让”,称赞她“然三官之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①商三官虽是替父报仇,但她是建立在对封建黑暗统治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其行动便超出了为父报仇的范畴。

《聊斋》复仇的第二类形式是异术型复仇。这类复仇者除具有前一类女性所具备的智慧、勇气、苦心孤诣、磊落品性之外,她们还具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侠女》堪称代表,此篇正面写报恩,侧面写复仇。侠女为报父仇含辛茹苦,三年时间“隐姓名,埋头项”,篇中虽未写她如何杀死仇人,但前面写她飞刀杀淫狐时“灿若长虹”,有如此高超神奇的剑术,方能凭借手中剑割下仇人的头颅。

第三类复仇形式是幻想型复仇。这类复仇多是爱害者在邪恶面前束手无策,但如果就此隐忍下去,读者的心里也会憋着一口窝囊气。于是作者极力发挥想像,让生前无法报的仇死了报,阳世报不了的仇,到阴曹地府去报。如《博兴女》中孤弱的民女,《窦氏》中纯情无瑕的窦女,《向杲》篇中的向杲,虽然这类复仇是在想像中进行的,但毕竟也可以给人以心灵的安慰。

与《刺客列传》不同,《聊斋》中的复仇多是报私仇,或为父死,或为夫亡,或者自身惨遭凌辱,虽然看起来不够宏大,但她们这种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动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倾向。

总之,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对侠客倾注最饱满的热情,对复仇者给予极大的崇敬和讴歌,以此而论,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其叙事的立场是宏大的;而《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蒲松龄取材的渠道多为“野叟曝言”,其视野是微观的,虽然看起来不够宏大,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泣鬼神。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Revenge: A Case Study of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KANG Qing-lian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P. R. China)

Abstract: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s a book written with rage an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acknowledged as a book written with rage and loneliness, too. They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the praise of revenge. Pu Songling has his own features while developing the same spirit of Sima Qian. Paladins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re regarded by others as person of honor, but they are lone ranger in Pu Songling's book and always help the poor people by themselves. It is obvious tha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expresses the concept of Karma. In addition, Pu Songling created many notable female characters that are endowed with the spirit of self sacrifice. Revenges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re all for friends or countries while it is different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Most of the revenges in Pu's are personal, but the struggle against despotism, power and evil is still very touching.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paladins; revenge

[责任编辑:刘运兴]

①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375页。